

●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失去的大观园

SHI QU DE DA GUAN YUAN

红楼梦

康来新

河北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胡 旻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失去的大观园

红楼梦

康来新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8,875印张 180,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0 定价：2.50元

ISBN 7-202-00116-0/I·10

• 出版说明 •

“以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原来，她就象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一样。

“我渐渐地懂得了事物的母性，那俯视着我的山峦也是一位母亲。每到傍晚，薄雾就缭绕在她的肩头、戏耍在她的膝前。

“现在想起了溪谷，溪底的流水给荆棘遮住，远看不见，只听得它潺潺歌唱。”

这首诗是一位智利女诗人加·米斯特拉尔所作，它热情歌颂了智利文化，这里借用来赞誉中华民族文化对其人民无私的哺育和滋养亦是最恰当不过的。

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最切近人间的文化，它的基本格调不是超世俗的，而是表现注视、参与和反映人生的，是一种本质上的知行合一。思想艺术与生活实践（与今日之实践有差异）熔铸在一起，它在研究宇宙、艺术的大问题时，常以生活实践为绪端，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着手处，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从而有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即是真知（真理）。真知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求善、问善、迁善。对于中国文化看来，真善非二，本身就是二本一物，至真的道理就是至善的准则。弃善求真，则是妄谬的。因此，中国文化不同于他国的文化，偏重于对宇宙一般规律的研究与人生紧密相联，字

宙真实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后一方面又重于前一方面。所以，寻求人生最高准则，着眼点在于当世的现实生活、人伦道德和政治斗争，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正如高上秦先生在《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出版的话”中所说：“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等等种种，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煌、缤纷灿烂地造就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博大久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中华民族由此母体的滋润，又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强壮不衰的养分。然而到了现代，尤其是近代，对于这样一个亲民爱民、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理解和把握呢？毋庸讳言，在当今的中国，不说一般人，就是我们的受了十四、五年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究竟认真读过几部历代经典古籍呢，了解几许先哲的经验智慧？如果连中国重要的典籍都未曾见过，遑论其他？

今日的年轻人，对西方的社会理论颇感兴趣，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科恩、弗罗姆等成了一时的议论话题。这种现象是不是好事，值得商榷。诚然，西方社会理论及文艺思潮，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借鉴和吸取的，即使弗氏、尼采的理论也不是尽是谬误或说全是粪土，其中也有真理的颗粒可以为人所撷取；然而，由于我们的年轻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母体认识不足，一味信服西方文化，从而减弱了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与以前属于读书必备的“经学”常识，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诚然“向西方经验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气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

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然而，“它也疾风迅雷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导出诱人的魅力。现代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宽厚雄宏，开始在中国典籍里寻求智慧的泉源。作为龙的传人的现代中国人——中国的年轻人，要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崛起和为世人所瞩目，应该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的基础上。如果一味信从吸收西方的东西，可能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看，势必会泯灭民族精神的再殖力，民族的创造力将会枯萎。从这种观点出发，我社出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版的《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这套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圣书”《论语》曾经涵育了多少读书人的成长；“儒者的良心”《孟子》又曾激励过多少读书人的进取，时下已很难统计。历史正是这样，自汉以来学术史上那些硕士大儒成才的史料，实证了《论语》和《孟子》的价值。我们坚信：在几十、几百年后，当当代史被未来的史学家所总结、研究着的时候，《经典宝库》津逮来学的不朽意义，将得到证实。如今我们出版这套书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让我们的青少年（大陆青少年），“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沛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为了方便大陆青少年阅读，我们将原版竖排改横排，繁体字改简化字，对于原版中有字、词、句子和标点的明显舛误作了更改；基于印刷质量和大陆青少年的购买力，我们对于原版中的“文物选萃”只得忍痛删去。对于原版中的观点，我们基本赞同，极个别的观点与我们看法则大相径庭，为了尊重原著者的权利，

我们一般不作改动，读者对此也自有公正看法。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祖国文化繁荣和弘扬的职责。我们出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为大陆青少年提供了解自己祖国深远文化的精神食粮，想必也是原出版者和作者的心愿。我们也有原出版者和作者的拳拳之心，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

高上秦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等等种种，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物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煌、缤纷灿烂地造就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可是，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亲民爱人、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

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就是我们的莘莘学习的读书人，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遑论其他？

特别是近年以来，升学主义的压力，耗损了广大学子的精神、体力；美西文明的风行，导引了智识之士的思虑、习尚；电视、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官能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美国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固然鲜明了这一现象，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优势文化”的辐射圈内，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

何况，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自内在而言，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它也同时疾风迅雷般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将近五十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曾对我国教育作过一次深入的探访，在报告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支援意识”的能源；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这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我们也都看到，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颠沛造次，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乃至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选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需求，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

所共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识——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

为此，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流畅生动外，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并且是长期居住或成长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在这个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蕴义。

也是为此，我们首先为这套书订定了“青少年版”的名目。我们也曾考虑过一些其他的字眼，譬如“国民版”、“家庭版”等等，研拟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青少年版”。毕竟，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阅读力的年岁，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彻的智慧、广博的经验为友，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而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才不会是一句口号。

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恳盼，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众的邀请。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创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国中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都能喜爱它、阅读它。

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它的包容与广大。每一时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它们或惊或叹，或悲或喜，或温柔敦厚，或鹏飞万里，虽然形式多端，诉求有异，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像《四库全书》对佛典道藏的排斥，像

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经济探讨、敦煌遗墨，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

就这样，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历史价值的肯定、多样内容的考量下，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四十五部经典。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所以采用“经典”二字为这四十五部书的结集定名，一方面是一——《说文解字》所解释的，“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所说的，“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的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条理。另一方面——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它们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一些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

与这个观念相表里，我们在这四十五部经典的编印上，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改写以后也都同样亲切可读，我们企冀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阻碍了可能的欣赏，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谛旨了。

但在另一重意义上，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当然，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

也是在这种种实质、阅读的要求下，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有所融汇与变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帝国，一般大众实难

轻易地一窥堂奥。新版的《帝王的镜子》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形式也类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目的照顾下，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其它的部分经典，也有类似的写法。这方面，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远的不谈，就以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来说，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书最少的老子《道德经》，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短短五千言，我们却相对地扩充、阐释，完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由于历代经典的续纷多释，体裁富丽，笔路万殊，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过个别的协调，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交互运用，以便充分发皇原典精神，又能照顾现实需要，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

无论如何，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知识成果。我们明白，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

除了经典的编撰改写以外，我们同时搜集了各种有关的文物图片千余帧，分别编入各书。在这些“文物选粹”中，也许更容易让我们一目了然地感知到中国：

那样朴素生动的陶的文化，刚健恢宏的铜的文化，温润高洁的玉的文化，细致优美的瓷的文化；那些刻写在竹简、丝帛上的历史，那些遗落在荒山、野地里的器物；那些意随笔动的书法，那篇文章，那绘画……正如浩瀚的中国历代经典一般，哪一样不足以

惊天地而泣鬼神？哪一样不是先民们伟大想象与勤恳工作的结晶？看起来，它们是一幅幅独立存在的作品，一件件各自完整的文物，然而它们每一样都代表了中国，都焕发出中国文化绵延不尽的特质。它们也和这些经典的作者一样，是彼此相属，相生、相成的。

这套书，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循序渐进，自浅而深。但愿我们的青少年，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沛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青少年版）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

历史在期待。

附记：

虽然，编辑部同仁曾尽了最大的力气，但我们知道，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漏。我们十分乐意各界人士对它的批评、指正，这不仅是未来修订时的参考，也将是我们下一步出版经典丛书的依据。

致读者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如果，如果世上的事，都一个“好”字可以“了”，那么该是多么的痛快与过瘾。

《红楼梦》原书有一首《好了歌》（这首歌也被我们当代的朋友谱写成曲，好像还是第一届校园民歌年度选曲的首奖呢），跛足道人的歌者，麻鞋鹑衣，疯狂落拓里，歌尽世人明知神仙道遥之“好”，却偏偏仍然执迷于尘俗各种“忘不了”的一份矛盾，明知其“好”，却又不能“了”，人生而如此，自是海苦无边了。

这样一首彰显主题意识的歌，在这本改写的作品中，却被忍痛割爱了，那么，这样的改作，可能“好”吗？

正因为原书是这样的丰富与伟大，故而举笔改写之际，总感无限沉重的压力，好象心底有一块永不落地的“石头”，又好象总是置身一场永远不能清醒的《红楼梦》魇里，好苦！好难！

其实，何苦这样呢？突然，石头落地，长梦醒来，好像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了。但求尽心尽力而为，唯愿这份诚挚化做小小的钥匙一枚，因为那门扇背后才是《红楼梦》原始的广

衰天地，改作只是通往原作的一个门径，改作原不能替代原来的经典，然而又多么希望因为这部改作，从而引发少年读者进一步探寻原典的意愿呵！

心理的障碍虽然撤除了，实际的工作还是困难重重，原作出现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位，故事长达一百二十回，将近百万之言上下。就单纯只是从中简约，说什么也够让人左右为难，提放不下的。于是，只好凭着个人最真切深刻的感受，挥起大刀与阔斧，横心剪删，却不免还是怕伤害到了原典。

当然简约删裁之际，终不免关系于主观的尺度问题，其实阅读《红楼梦》以来，所能深深体会的，也正是“标准尺度”的界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究竟在各种生活的项目中，什么是真、假、有、无呢？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取应该舍的呢？反复向字里行间寻索，呵，所谓的真假有无，可能还是在于一己切身的感受与追寻吧！我佩服书中的甄士隐与贾宝玉，他们并不以梦里的教训为戒，务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真实面对人生残酷的考验，从而在痛苦里勘悟，这样正视生命的勇气，这样诚实的怀疑，清明的彻悟，最后平静的顺服，才真真是人中之人，凡俗中的凡俗，才真真是人上之人，凡俗中的不俗吧！当一切归于幻灭虚无时，曾经当真掌握过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就是那份真实追寻的过程吧！

所以必须先撇开耿耿于衷的得失计较，因为至少在进行改写过程间，我个人是怀以无比的真诚与虔诚哪？如果我用这样的理由，来请求各位的包容与了解，各位可能领首接受吗？

而改写《红楼梦》的困难，还不单纯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这部争论不下的书，屡屡牵引出作品外国的问题，就像原书的作者是谁？

才是大清早起来，闻到酒香，就忍不住狂饮的欲望。秋风更兼秋雨，寒湿凛冽袭来，为了这么一位诗酒风流的好朋友，索性

解下怀里佩刀，去典当几文银钱，也好沽酒来喝。

佩刀质酒的人是敦诚，至于那位诗酒如狂的仁兄呢？他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呀！竟然可以赢得友朋这样热烈而慷慨的爱戴、呵护！

深黯的肤色，胖胖的身材，顶着一颗聪明的大头颅，所到之处，便酿出温暖的一阵春风。呵呵谈笑，痛快饮酒，说起故事来，尤其娓娓动听。怎么只要有他在，日光月阴便如飞而去，从来也不会感觉任何的无聊？

朋友们喊他“芹圃”、“雪芹”、“芹溪”、“芹溪居士”或者“梦阮”。呵，这么多字呀号的，把人都搅和不清了。当我们展读《红楼梦》，在第一回中，可以知悉这部书的写作缘起，乃是经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于是两百多年来，大多数读者便因此相信这位“曹雪芹”就是这部书的作者。

可叹的是：如此金石之作的作者，有关他生平的直接史料是这样的零星稀少。这多少像文学史上许多的古典小说吧！总要耗尽学者许多工夫先去辨识作者是谁，而这些作者又不像从事诗文写作之流，往往因为传世作品，或者作者本身事功以及宦海生涯，而可以在青史上捕捉一个生平的大概。仿佛小说的写作，是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大雅的。而曹雪芹尤其像是一生潦倒，未曾涉身官场的落拓之人……。

要感谢许多红学的学者们，是他们孜孜的努力，是他们从当年曹雪芹友朋的诗文里（像敦敏、敦诚兄弟，像张宜泉……），爬梳清理，逐渐使曹雪芹朦胧的身影清楚起来，雪芹被家族命名为“霭”，曹霭，字雪芹。这“霭”，极可能缘于家族喜用诗经命名的习惯，《诗经·小雅·信南山》中不就有“上天同雪，雨雪雰雰，益以霏霏”，既优既渥，既霭既足，生我百谷”的句子么？因为诗里“雪”、“霭”的关合，所以才会有“雪芹”的字吧！至于其他的什么“芹

圖”、“芹溪”、“芹溪居士”、“夢阮”等，可能都是別號了。

“霽”固然典出《詩經》，但極可能也是出于聖主養民、仁霽思洽的一份感謝之忱。說到這，就要涉及曹氏家族與皇室的关系了。原來這個家族是滿化的漢人，屬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旗主的奴隸和世仆，屬內務府統領，往往是皇帝的親臣近臣，經常掌握特種財務機構，如鹽務、鈔關、織造、海關等等的職權，算是極有權勢的一項肥差呢！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似因與康熙特殊的关系，開始榮顯起來，奉派為江寧織造，以後雪芹的祖父曹寅也繼任這個職位，並曾擔任康熙皇帝南巡時的接駕工作。也就是在曹寅時代，這個家族達到中天的輝煌燦爛，物質的繁華不必說，更重要的是詩書文學傳統的建立——與詩文名家來往唱和、購買、搜藏、印刷大量的書籍，成立家族的戲班……這種種就成為小小雪芹成年後寫作的不懈泉源了，然而，這世上沒有百日紅的花朵，更沒有不變的好時日可以長享，等到雍正皇帝繼位，因為種種政治的牽連糾葛，曹家敗落了，光景相當慘淡。到了一七一五年，康熙皇帝特令曹寅過繼的儿子曹頤（許多人相信曹頤便是雪芹的父亲）承祧襲職，算是救了這一家人，曹家對此浩蕩宏恩，十分感戴，所以推斷：彼時出生的曹雪芹，正因家人為紀念皇恩，而被命名為“霽”了。當然，這並不是定論，因為也持有一說：小嬰兒是在稍後的一七二四年，雍正初年而出生的。生年不可考，根本生年就是從費人猜疑的卒年推算的，卒年是乾隆二十七年的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抑或是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這些生生死死的年代日期，每每成為紅學考證的熱門話題，彼此糾纏不清。

呵，先不理這些惱人棘手的問題吧！對於初訪紅樓的讀者，生卒的年代可能純是數字而已，並不能喚起我們對作品欣賞的生動聯想呢！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寧可多知道作者生活的點點滴滴，脾氣與性情，是不是？